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29-042-MY2

執行期間：99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陳以愛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楊子葳、高于婷、黃勤雯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29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完整報告

NSC Project Progress Report

〈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

目錄

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二、報告內容

1.前言

2.研究目的

3.文獻探討

4.研究方法

5.結果與討論

三、參考文獻

四、計畫成果自評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完整報告

NSC Project Progress Report

〈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

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以1910-1930年代為考察段落，聚焦於下列主題的探討：「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形成」。首先，以學者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評價為中心，重建學界對「新」、「舊」史學的討論及爭議，闡述民初學界對「新」、「舊」的標準和分際，是如何經歷一場觀念上的變革，最終才漸漸獲得基本的共識。其次，復以學界「尊王」輿論的形成為中心，探討民初考據之風的興起，以及王國維在其間所扮演的角色，並進一步討論學術評價標準形成之原委及其過程。

關鍵詞：王國維，胡適，考據學

二、英文摘要

Wang Kuo-wei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academic criticism in modern China

This project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Kuo-wei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academic criticism in modern China. Firstly, it will reconstruct what would most possible be the scholars' reviews of Wang's works concerning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and figure out whether if Wang created a new approach to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Secondly, it will also clarify how changed the scholars' conceptions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w and the traditional of the historical work, which were eventually integrated into a compromised standard. Moreover, it will reconstruct the common opinions about Wang's contributions, and concentrate on Wang's role in the rising of the textual criticism, in order to reveal the academic road that the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went through from 1910s~1930s.

Keywords: Wang Kuo-wei, Hu-shih, textual criticism

二、報告內容

1. 前言

2007 年底，本人應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中山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合辦「傳承與創新：新世代的歷史學」學術研討會會方的邀請，提交一篇以「傳承與創新」為主題的研究論文，向來自兩岸四地的新生代歷史學者請益。本人思索論文主題時，重新翻閱前一世紀歷史學界的重要文獻，饒有興味地發現 1917 年是中國近代史學史上一個劃時代年份。這一年，王國維接連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三篇，運用「二重證據法」，以新出土的甲骨卜辭與紙上的舊材料參照對證，證實《史記》關於殷商世系的記載大致無誤，又發現《山海經》、《楚辭·天問》等古籍中的神話傳說，並非全屬荒誕，而是有相當的史實為依據，開出一條「古史新證」的道路。同一年，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躍登北京大學講壇教授「中國哲學史」。胡適講中國古代哲學，以「截斷眾流」的氣魄，「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提出「對於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只可存一個懷疑的態度」，開出另一條疑古辨偽的路。王、胡兩位，一位被尊為「考古派」的巨擘，一位推為「疑古派」的開山，在學界帶動了兩條截然異趣的治學途徑，又皆被同時代人及後學冠以「新史學」的榮冕，是一個值得探索的現象。本人深感興趣的是，王、胡兩位是如何看待對方的研究業績的？他們的史學到底「新」在哪裏？他們又如何評價自己的史學工作？1917-1937 年間中國學術界又如何看待他們兩位的研究業績？

本人經過初步探索，在 2007 年年底「傳承與創新：新世代的歷史學」學術研討會議上，宣讀〈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初稿。是文經過補訂後，刊載於《歷史研究》。是文以篇幅所限，只集中探討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諸作的回應，主要以 1917-1922 年作為段落，闡述胡適是如何在王國維著作的影響下，從一開始主張對東周以前歷史存而不論，到轉為公開承認「甲骨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的證據」的新結論。然而，本人經過考察後也發現，胡適相對於北大學圈其他人，並不是最早也最熱烈接受王國維研究成果之一人。相反，他對王國維的認識及評價，始終處於一種相對被動、相對落後的狀態。概括的說，胡適對王國維的公開推崇，與其說是本人熟思深慮後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受其他北大學者的影響。甚至胡適的後輩如顧頡剛、陸侃如，都較他更早閱讀王國維的著作，開始經歷程度不一的知識上的洗禮。若非當年北大同事如錢玄同、西洋學者高本漢、以及 1920 年代初中國學術界氣氛的普遍帶動，胡適能否在 1922 年底對羅振玉、王國維作出嶄新評價，進而接受羅、王以甲骨文證實「殷商一代歷史」的論斷，是頗可懷疑的。

不過，本人對王、胡學術關係的探討，並不止於上述結論。因為眾所周知，胡適即便接受王國維對殷商歷史的研究成果，他及錢玄同、顧頡剛對古史的懷疑，仍未出現根本性的改變。「古史辨」在 1923 年以後風起雲湧，引領一時風騷，便是絕佳證據，說明胡適等對王國維的研究方法及結論仍有所保留。不但如此，即便到 1922 年下半年，即胡適已接受王國維對殷商歷史的論斷之際，他在私下與錢玄同的一次談話中，仍把王國維劃入「舊派學者」的行列，以為中國近代的「新史學」尚未成立。可是，到了 1935 年 4 月，在北平學界爭論是否「讀經」的雜音中，胡

適卻在一篇時評〈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提到王國維其人其學時，並作了如下評語：

最新的經學，最新的治經方法。始創新經學的大師是王國維先生，……是近代一個學問最博而方法最縝密的大師……。

1936年1月，胡適應顧頡剛的邀請，為顧氏標點的《崔東壁遺書》作序文，更明白地指出：「中國的新史學」已經建立，而當代「新古史學」的特色，便是：

能夠充分運用發掘出來的甲骨文字、金文和其他古器物。

觀胡適文中論及近代學人能利用精密方法來研究的「科學的史家」，其開列的名單依次是：

王國維、羅振玉、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諸先生……。

王國維竟赫然居眾人之首。以此與胡適十餘年前的觀點對照，不能不令人感到其間的絕大差異！

本人所關心的是，在胡適把王國維從「舊」史家的行列，改劃進「新」史家之範圍，並推其居首位，這其間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轉變？一個擺在研究者面前的醒目問題是：到底胡適劃分「新」、「舊」的標準是甚麼？他在1920年代初把王國維納入「舊派」行列，是基於一種怎樣的評判準則？當時，胡適心目中的「新史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著作？他後來對「新」、「舊」的劃分，又是改用了怎樣的標準？又他的評判標準的轉變，是否接受了誰人或哪一種學風的影響？影響他的學人或學風是甚麼？這一學風又是如何形成的？

扼要的說，本人想要透過對王、胡學術關係的梳理，一方面釐清他們之間的相互評價，一方面探問民初中國學界的評判標準的內涵，並進一步探討這個評判標準轉移之根本原因及發展歷程。

2. 研究目的

本人對王國維和胡適的學術交涉的研究，不只因為王、胡兩位是中國近代學術界的中心人物，而學界對兩氏的研究及評價，至今猶呈現「言人人殊」，「見仁見智」的分歧狀態；更因為本人深深感到，對於王、胡關係及其相互評價的剖析，可以揭示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而其中有一部份猶對今人有重大參考意義及價值，此即「學術評價標準」一課題。

其實，本人在初步考察王、胡著作及其反響的研究過程中，不斷反覆思索下面一個現象及問題：一般說來，考察中外學術史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從初次發表，到被某一特定學術社群所普遍承認，其間所需花費的時間長短，可以作為衡量一時代學術社群的指標。這一考察的過程，又可以使人瞭解到該社群內部的諸種運作情態，深化我們對某時代學術發展的具體認識。而本人覺得，對王國維「古史新證」諸作的發表，以及學界對這一系列著作的反應，正可作為考察民初學術史的一個絕佳範例、一個絕佳指標。

猶有進者，本人從踏足近代學術史研究之後，就一直被下列問題所深深困擾：到底中國近代學術界是否出現過一個自具「公論」的歷史階段？陳垣先生在1930年代所說的：「師法相承各主張，誰是誰非費評量」，是否為民國學術史發展的一般

狀態？然而本人也注意到余英時先生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一文中，特別指出錢穆先生晚年承認，「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這種「客觀」的學術評價的「標準」，「可惜為戰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與錢穆的看法可以相對照的是，近年本人翻閱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發現這位當年執教北平幾所大學的版本目錄學家倫明，曾如此描述戰前北平學界的輿論狀態說：

十餘年來，故都言國學者，靡不曰王靜安，幾如言漢學者之尊鄭康成，言宋學者之稱朱子也。

倫明以「鄭康成」和「朱子」比擬民初學者對王國維的普遍推崇，是一個絕對不容忽視之的描述。而與我們對戰前北平學界的普遍氣氛，在認知上頗有落差。然而，倫明的話是否誇大其詞？抑以相當史實為依據？若倫明的話是確有所據，那麼這段話已透露出一個重要的訊息：此即抗戰爆發前的中國學術界，至少是北平學術界，已漸漸形成一套共同的學術評價標準。在這一評價標準形成的過程中，王國維其人其學成為「新」、「舊」學者所共同尊奉及摹仿的對象，開始發揮著某種制約及指引後學的作用。也就是說，從晚清到民國初期，中國文史之學已經從「道術已為天下裂」，逐漸轉變為「萬流歸宗」的新形勢了。

本研究計畫的提出，便是想要以下列主題：「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形成」作為考察主軸，想要透過考察王國維著作在民初學界所引起的反響，探索下面幾個重要問題：第一，現代中國學界是否形成過一套普遍客觀的、學者共同遵循的學術評價標準？這個標準是怎樣的標準？第二，在現代中國學術門派林立之下，究竟存在過多少種競爭性的「典範」(paradigm)？如果在當時確曾存在一部或好幾部「典範」，它們在何種程度上發揮過作用？是怎樣的一種作用？第三，上述「典範」的形成，成為學術界所普遍摹仿的對象，究竟花費了多長的時間？本人期待上述問題的解答，不止有助於釐清 20 世紀初中國學術界的複雜面貌，也有助於當代文史學者面對我們這時代的知識上的挑戰。

3. 文獻探討

就本計畫所擬採用的第一手文獻言之，近年新刊佈的學術史材料，數量繁夥，其中與王國維、胡適相關的史料，亦是層出不窮。綜合所有新舊史料，依其性質大致可分為下列幾種：一，學者的論著，包括專書或論文；二，傳記資料，如日記、書信、自傳、回憶錄、年譜等；三，報刊雜誌：包括雜誌、學報、以及報紙上的文史副刊。四，資料匯編，如《古史辨》之類。本人明白到，上述性質不一、來源不同的史料，單恃一類皆不足以明史事之真貌，故須努力搜求所有遇得到的史料，再予以參證互釋。而上述史料中，與本研究計畫直接相關，迄今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的史料，是民國時期報紙的文史副刊，其中尤以 1929-1937 年間《(天津)大公報》先後發行的 313 期〈文學副刊〉及 191 期〈圖書副刊〉，其中有許多書評類的文字，為本計畫所擬充分利用的第一手文獻。

二手研究成果方面，由於王國維和胡適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對兩氏研究業績的總結，及其中國近代學術史的影響的研究，一向引起研究者的濃厚興趣，從 1980 年代以來更累積了眾多研究成果。然而，就本人考察所及，重要而值得細心參考的研究成果其實不多，主要有下列幾位大家作出重要貢獻，並提示後學

若干研究方法及方向，以下試簡略評述之。

以胡適研究而論，毫無疑問地，余英時先生在 1980 年代出版的一本小書《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迄今猶指引著無數國內外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視野。余先生借用孔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的「典範」一概念（大陸學界譯作「範式」），更被許多研究者廣為借用，並以此作為胡書《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書（1919 年 2 月出版）在民初學術史上的基本評價。至於隨後在大陸的一片「胡適研究熱」中，羅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2006 修訂本），書中雖然只敘及胡適的前半生，卻是迄今所見最傑出的一部胡適傳記。羅書大抵以余先生的立論為基礎，再進一步作出更細緻的敘述及發揮，使得胡適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關鍵地位，再一次得到了強化。然而，本人綜觀余、羅先生的著作，深深感覺到民初學術史的繁夥龐雜史料，似尚未充分進入兩位先生的視野，故後學猶有可以努力的方向。

就王國維研究而言，很可能是由於《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以及 1989 年以後大陸地區的一片「國學熱」，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越來越獲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及重視，導致相關的研究成果（包括學者的文集和專著）不斷出版。在這樣的熱潮中，王國維其人其學獲得越來越多研究者的注意。然而，若以今所見的三輯《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1983/1987/1990）以及《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 120 周年學術論文集》（1999）而論，「王國維研究」的水準仍多停留在「述學」及「紀念」的層次上。若再以新近出版的幾種王國維傳記或年譜（長編）而言，能把王氏放在中國近代學術史的整體脈絡之中，作出深刻而全面的歷史考察及歷史評價者，迄今猶未之見。

有意思的是，目前海峽兩岸對王國維或胡適作出最深刻的研究，而其發表的研究成果也最貼近當時的歷史原貌，倒是本人並不專門研究王、胡的桑兵、王汎森兩先生。

先論桑兵先生。1990 年代以來，勤治中國近代史的桑兵先生開始涉足中國近代學術史研究，並以其精勤的治學風格，先後交出三部論文集（《國學與漢學》（1999）、《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2001）、《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2008）。三部論文集不少文章，雖並非以王國維為主題，卻或多或少都牽涉王國維其人其學。其中與本計畫密切相關者，是桑先生的一篇〈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視差與胡適的學術地位〉。這篇文章主要討論胡適的學術地位，而採取與余英時先生不同的考察視野。桑文的撰寫，是由本人在 2002 年發表的一篇短文〈胡適的「整理國故」在 20-30 年代學術界的反響〉出發，進而指出：「胡適怎樣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崛起，風光過後受到怎樣的批評，胡適如何回應以及有關爭議對於近代中國學術的路徑走向產生何種影響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桑先生與本人的若干考察視野及研究方法，實有足以互相呼應之處，即擅於運用「通語境以解文本」之法，尤其注意近代學者之間的相互評價，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來幫助對文本的解讀及分析。可惜桑先生在是文中，未對民初學界對王國維的具體評價，以及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有所抉發，更未全面考察及探討民國學術評價標準的形成原委及過程，十分可惜，也構成本計畫所準備著墨的方向，以稍補其缺漏。

再論王汎森先生。王先生的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其起步較桑兵先生為早，從其在研究所期間撰成的《章太炎的思想》(1985)、《古史辨運動的興起》(1987)、以及由博士論文修訂而成的專著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 的傳記式探討，再到近年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2003)，無不對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而在王先生新近出版的論集中，更有對傅斯年及史語所學者的學術淵源及影響作出發點，探討近代學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例如：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胡適和傅斯年的學術關係，皆根據新舊史料來作出新穎的論斷。可惜王先生所關注的對象，往往集中於史語所一系學人，因而有時不免放大此派學者的影響，而未能對於民國學術界的複雜面貌，作出更細致而視野開闊的評析。至於史語所前所長杜正勝先生，近年在王先生提示及幫助下，亦稍涉足近代學術史研究。其前些年出版的《新史學之路》(2004)，便收錄了近代學術史研究論文若干篇。可惜杜先生在歷史描述及解釋上，有時亦難免放大史語所的地位及貢獻所在。又因其學術專業本不在近代史領域，故下筆每有解釋錯誤或誤認史實之情形，然其有時亦有一得之言，仍值得研究者參考。

再者，若以研究主題而論，本計畫所縈繞於心的「學術評價標準」一問題，前些年劉龍心根據其博士論文修訂而成的專書《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之建立》(2002)，其中第四章第三節「客觀標準與學術環境的追求」，便討論到學術評鑑的標準，與本計畫所關切之題旨頗為相合。可惜劉書所徵引的史料，多半從傳記資料中摘取民初學者的片斷意見，尚未能廣泛且充分地利用當年湧現的大量批評文字，重建起當年歷史發展的豐富面貌。再者，劉書所著墨的重點，又多侷限於史學形式的追求及建立上，而未深入學術論著內部作出探討分析。因此，不管就史料的利用言，或就學術著作的內容言，都有更進一步拓展及深化的空間。

總而言之，本計畫既立基於上述學者的研究業績之上，又略悉其不足或是疏誤之處，而欲對王國維和胡適的學術關係，以及由兩氏所帶動的學術研究方法及方向，作出更深層次的討論。更欲進一步梳理及重建民初學術界的學術評判標準的內涵，以及其形成的過程原委，以作為今日文史學界的借鑒。

4. 研究方法

論到本計畫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亦即歷史研究的方法，本人服膺近代史學研究者所遵循的共同原則，即搜集及整理所有遇得到的史料。關於本計畫所運用史料的範圍，本人在上述「重要參考文獻」部份，已經提出就本計畫的範圍而論，大致有四種性質的史料：一，學者論著；二，傳記資料；三，報刊雜誌；四，資料匯編。這四種性質的史料，在本人搜集及閱讀過程，接下來便是解讀及分析。

至於解讀及分析的方法，或說整理史料的方法，本人欲首先按史料的發表順序，先製訂一份資料編年，以統整及排列所有相關文獻。這一方法，實是本人研究所有歷史課題的共用之法。運用此法的目的，一方面是建立文獻資料庫，一方面也有助釐清史實發展的因果關係。對於此一方法的運用，本人在 2006 年度國科會申請計畫案中提出：「本人深信，精確無誤的繫年工作，乃是歷史研究的根本所在。」不但如此，根據本人此前編寫《胡適學術年譜長編》的經驗，「已知向來被研究者視為原始文獻而加以利用的許多資料匯編，例如：學者來往書信集、年譜、文集等，

其中存在不少錯誤。而在編訂著述繫年的過程中，則可以發現及糾正許多這類錯誤。」因此，本人在進行這次研究計畫時，仍擬沿用這一方法，即隨時根據搜集到的新舊史料，以編年繫月日的方式，來統整所有相關的原始文獻。

然後，本人再依據傅斯年先生多年前在《史學方法導論》中所提示的歷史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本人以為傅先生的這一史學方法論，迄今猶不減其光輝及效力，故仍擬努力在「比較不同的史料」的過程中，抉發近代學術發展的曲折過程。

由於本人所擬利用的文獻資料，不少屬於學者的自我評價及相互評價之詞。面對這類評價性的史料，本人充分意識到其中所可能蘊含的陷阱，此亦即本人在博士論文〈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行〉「引論」中所提出的，專就傳記性史料的而言，「以日記來說，其中固留下若許真實記錄，然諱飾之詞亦時時雜見。至於回憶錄或自傳之為體，因其泰半屬學者晚年所撰，記載失實之處不一而足；且其撰述之際，固已成名，又知文成後將公佈於世，諱飾或自炫之詞往往更多。若乃弟子記述師長行誼的回憶文字，誇大失實的情形尤其普遍。至於學者間的往來信函，客套門面語更多，若不細加辨別，所撰所述恐去信史遠甚。」而上述史料的內在問題，若就公開發表的書評類文字而論，也往往會出現弊病相同的同派誇飾，敵派詆毀貶抑，或學人之間常有的客套門面之語。也因此，研究者利用時便須充分注意，決不能僅就一人一家一派的立論來撰寫，而是必須時刻與其他學人，乃至不同來源及性質的史料一起對讀參證，才有可能減少誤讀誤判的可能。總而言之，善用及慎用各種新舊史料，實是從事學術史研究者的重大考驗。進行這部份工作時，傅斯年先生所提示的：「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則又是研究的不二法門。

總的來說，力避據單一史料作出結論，減少「以傳主之是非為是非」之病，是本人時刻放在心上的研究準繩。

5.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以「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作為主題，透過考察王國維著作在民初學術界所引起的反響，結果有一個有趣而重要的發現，此即王國維著作的影響力之擴大，乃至於其著作在中國學術界「典範」地位的形成，有一部份是透過1928年出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來達成的。在傅斯年的宣揚下，王國維著作在1920年代-1930年代的中國文史學界，發揮了一種示範性作用。而傅斯年本人在王國維著作的影響下，也寫出一系列古史研究著作，對於近代學風的轉移有相當影響力。牟潤孫評論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一書，就指出傅斯年的古史觀的轉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傅氏在《性命古訓辨證》一書所表示之對古史態度，允為五四疑古風氣盛行後，史學上一劃時代事件。蓋王國維氏之說，雖為學人尊信，而風氣所趨，並未能使喜新好異之流，盡棄其古史破壞論。追隨錢玄同顧頡剛先生，謂夏史不可稽，堯舜無其人者，時猶大有人在。傅氏為新文化健將，與顧先生號稱同調，主持學術工作數十年，能為此平情近理之論，其轉移風氣之功，寧

不偉歟？

然而，傅斯年在古史觀上的轉變，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據王汎森、杜正勝的研究指出，傅斯年早年是疑古論者，甚至胡適的若干疑古論述也受過他的啟發。傅斯年接受及推廣王國維著作（包含其研究方法及主要結論）的歷程是如何的？也就是說，本人意圖透過考察王國維和傅斯年的學術連繫，來發現及說明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形成一問題。

從事這項考察時，近年新刊佈的一些史料，發揮了重要的證據作用，使本人意識到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恐怕遠遠超出學術界的認知。羅家芳、羅家蓉編輯校註的《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收錄了一封傅斯年〈致羅家倫函〉（1926:11.9），這封首度披露的函件，直接透露出傅斯年對王國維的高度推崇。傅斯年此函向老友說明不欲就清華大學聘任之原因，其理由與王國維有關：

到清華本無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處我畏王靜庵君，梁〔啟超〕非我所畏，陳〔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

這一段話，清楚揭示出傅斯年對王國維所懷的景仰之情。而且，此函撰寫的時間點，是傅斯年甫從歐洲返抵中國之際，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尚未創辦。本人有理由相信，傅斯年在歸國前後，已從師友的著作及討論中，在相當程度上瞭解王國維的研究業績。

本人又廣泛搜羅 1926-1928 年中國刊佈的各種報刊雜誌，發現到中國文史學界正在掀起一股熱聲浩大的「尊王」熱潮。在這股熱潮下，王國維的新舊著作被爭相刊佈及廣泛討論。就本人搜羅所知，各報刊發佈過「王國維紀念專號」者，至少有下列六種：

1. 《文字同盟》「王靜安先生追悼專刊」（1927 年 7 月出版）
2. 《文學週報》「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1927 年 8 月出版）
3. 《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1927 年 10 月出版）
4. 《國學論叢》「王靜安先生紀念號」（1928 年 4 月出版）
5.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1928 年 6 月出版）
6. 《學衡》「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1928 年 7 月出版）。

細按這六種報刊雜誌收錄的眾多文字，作者包含了中外（日本）新舊老少各派學人，反映出一個普遍性、席捲南北的「悼王」、「尊王」熱潮。這一股潮流，使兩年後哀悼梁啟超逝世的反應，竟大大相形見絀。本人認為，傅斯年在這樣的「尊王」熱潮中返國，計劃展開他的學術生涯及學術事業，必然會細讀王國維的各種著作，進而受到深刻的影響。

本人的這一推想，在最近刊佈的《顧頡剛日記》中，又得到相當程度的證實。從史料綜合來看，傅斯年搜讀王國維著作的時候，清華國學院研究院的助教、研究生，以曾親炙王國維之故，對渴望瞭解王國維的傅斯年來說，特別的具有吸引力。其中，傅斯年和徐中舒的交往，特別透露出這樣的性質和意味。在徐中舒的說明下，傅斯年得以迅速靠近王國維的學術世界。有論者指出傅、徐在治學態度和研究方法上的親近性，其實正是傅斯年接近王國維治學途轍的反映。在王、傅親近的過程中，傅斯年的學術觀點，越來越遠離於他的舊日師友胡適和顧頡剛。這一個漸行漸遠的過程，在《顧頡剛日記》中，也有一些隱約而片斷的描述。總括地說，1920 年代末

以來，傅斯年在古史觀上所表現的從「疑古」到「重建」的巨大轉折，是絕不能不充分考慮王國維所造成的影響。

不但如此，再搜讀 1920 年代末至 1930 年代傅斯年所撰寫的幾種史學方法論，以及其一系列古史研究論著，都可以看到王國維影響下的痕跡。就史學方法論而言，下面三種著作：〈史料論略〉（1927 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 年）、《史學方法導論》（1930 年），在在顯示傅斯年在方法論上，是如何愈來愈接近王國維的立場。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傅斯年承受王國維的新舊史料互釋的研究方法及史學實踐，進而大力倡導以直接材料與間接材料的釋證，視為近代史學工作的最高準則。由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開出的學術事業及研究業績，也在這一準則的指引下進行。這樣看來，傅斯年所領導的學術工作，以及他在中國文史學界所發揮的「轉移風氣之功」，乃是一種以王國維著作為基礎、為範本來達成的。

因此，本人在「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這一研究課題下的研究工作，是想透過探討傅斯年對王國維著作的反應來說明。目前正在撰寫的一篇論文，題目是〈從「疑古」到「重建」的近代中國史學——以傅斯年的學術轉向為中心〉，將會包括下列要點：

- （一）前言
- （二）傅斯年遊歐後期的古史觀
- （三）「尊王」熱潮
- （四）史語所創立前傅斯年的學術交往
- （五）傅斯年史學方法論的形成
- （六）王國維著作對傅斯年的「典範」作用
- （七）史語所事業的延續性與突破性
- （八）結論

藉由這樣的探討，希望能在「王國維與中國現代學術評價標準的型塑」這一複雜課題下，說明近代中國文史之學評價標準的形塑歷程。

三、參考文獻

1. 第一手史料：

《東方雜誌》

《國學季刊》

《努力週報》

《文學週報》

《國學月報》

《國學論叢》

《學衡》

《文字同盟》

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

《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共 20 卷（杭州/廣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顧頡剛編，《古史辨》，共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胡適，《胡適全集》，共 44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顧頡剛日記》，第 1-2 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共 7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錢穆，《師友雜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9。）

羅家芳、羅家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曹毓英選編，《錢基博學術論著選》（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徐中舒，《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徐中舒，《川大史學：徐中舒卷》（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

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新學術之路》，上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牟潤孫，〈記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下冊（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 1121-1151。

2. 近人研究成果：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店，1991。）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2004。）

陳以愛，〈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行〉（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研究部博士論文，2002。）

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2008:12），頁 105-123。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本人原先期待對近代中國文史之學的評價標準的形成過程，作出全面性的探討及說明。結果，發現這一課題涉及的面向極為龐雜，需要一本專書才能完成。故本計畫集中焦點，深入分析傅斯年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計畫有助於幾個問題的釐清：第一，就近代學術史的重建而言，本文指出 1920-1930 年代的中國文史學界是如何漸漸形成一套學者共同遵循的評價標準。學界在這一套標準指引下從事文史研究，又獲得了怎樣的研究成績。第二，就認識台灣文史學界的學術傳統而言，本計畫對王國維、傅斯年等人學術關係的探討，將有助深入瞭解台灣文史學界的知識傳統，並使進一步的檢討成為可能。第三，關於文史學界評價標準的形成，是現實上必須面對的複雜問題。本研究結果的持續性探討，應不止有助釐清 20 世紀上半期中國學術界的複雜面貌，也有助當代文史學者面對新時代的挑戰。